田明, 刘悦美. 基于户籍类型比较的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J]. 地理科学,2021,41(2):261-270.[Tian Ming, Liu Yueme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fferences and the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21,41(2):261-270.] doi: 10.13249/j.cnki.sgs.2021.02.009

基于户籍类型比较的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影响机制研究

田明, 刘悦美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 流动人口城市落户意愿是提高户籍城镇化水平，推进市民化进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从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和流入地城市因素 3 个维度，应用多水平回归模型，研究了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并着重比较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有更强的在流入地城市落户的意愿。初始能动性越高落户意愿越高、城市吸引力越大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高，随时间变化的中介因素是落户意愿变化的关键变量。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由于城市生活经历较少，个人能动性较弱，对各种因素更加敏感，影响其落户意愿的因素多且复杂；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个人能动性强，城市经历丰富，影响落户意愿的因素少，且对流入地城市的品质和区位有着更强的选择偏好。农业户籍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差异背后折射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个人能动性；户籍类型；影响机制

中图分类号: K9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1)02-0261-10

推动流动人口落户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落户目标能否实现，不仅与政策的落实有关，还受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按一般的理解，由于没有当地户口，在流入地的权益保护不足，流动人口应该有很强的落户意愿。然而，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并不高[1~5]。有研究认为城镇落户少是因为落户难、落户门槛高，归因于政策和制度因素[6~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 3 轮户籍制度改革，落户门槛不断放低，但每一阶段户籍改革的效果并不理想[2,4]。尤其是 2014 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人口规模 300 万人以下的城市基本上放开了落户限制，有些城市为了吸引人口，甚至推行零门槛落户，落户进展仍然不大。2015—2019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4.50 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了 4.48 个百分点[9,10]，二者之间的差距并没有明显改善。因此，撇除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问题，落户门槛高的观点无法解释落户规模小的全部现实。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与居留意愿的内涵具有一致性[11]，但影响因素和决定机制也存在明显差别[12]。落户意愿因人因地不同，影响因素和机制十分复杂，受到个人和家庭因素、流出地和流入地因素、制度因素等诸多微观和宏观因素的综合影响[1,3,5,11~20]。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随流动过程而变化的因素，比如是否跟家人同居一地[1,12]、收入[16]、就业质量[17]、社会融合程度[5,18]、居留时长[19]、语言掌握情况[21] 等也会对落户意愿产生影响。迁居行为或落户行为是不同的群体其特有的生活状况和经历，以及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在时间作用下相互作用的结果[22,23]。在所有因素中，比如年龄、家庭随迁、居留时长、收入、就业、语言掌握情况、社会融入[24] 等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与户籍类型、性别、受教育程度等较为固定的因素不同。有些因素需要关注细节，比如不能忽略婚姻与家庭随迁的细节，已婚且

收稿日期: 2020-02-10; **修订日期:** 2020-05-18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29）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871129).]

作者简介: 田明（1974-），男，河北康保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流动人口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等。E-mail: tianm@bnu.edu.cn

与家人在一起、已婚与家人在不同地点分居等不同情况下落户意愿差异很大，笼统地比较已婚和未婚并不合适。此外，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相比，多数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其流出地特征和自身特征与流入地及流入地居民一致性更高。因此，把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作为参照系，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进行比较，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落户意愿的影响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纳入时间因素的考虑，把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因素分为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和流入地城市因素 3 类，基于户籍差异分析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机制。其中个体初始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类型，以及流出地特征等较为稳定的因素；中介因素是在流动人口外出流动过程中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因素，比如外出时长、就业、收入、语言掌握程度等。城市因素指流入城市的特征，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构成等。本研究把微观层面的个体初始因素和随时间变化的中介因素与宏观层面的城市因素结合起来，通过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两类流动人口的比较，全面理解流动人口的落户行为，进而对推进市民化进程提供更为精准的政策依据，为判断未来中国人口分布演变趋势提供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数据

数据来自 2013 年和 2014 年国家卫生和计生委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专题调查”。该数据虽然相对陈旧，但作为社会融合的专题调查数据，准确度较高，变量齐全，且暂无替代数据。2 次调查共覆盖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和无锡市、浙江省嘉兴市、山东省青岛市、福建省厦门市和泉州市、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山市、湖南省长沙市、湖北省武汉市、河南省郑州市、陕西省西安市和咸阳市、四川省成都市等 16 个地级及以上市域（图 1），共 32 877 个个体样本。因为调查数据覆盖行政区，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流入地城市特征，地级市只研究市区，剔除了下辖的县和县级市样本。同时，把样本大于 80 个的 15 个县级市（包括：常熟市、江阴市、昆山市、太仓市、宜兴市、平湖市、石狮市、海宁市、桐乡市、晋江市、南安市、即墨市、胶州市、浏阳市、都江堰市）单独提取出来，连同 1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获得 31 个城市的样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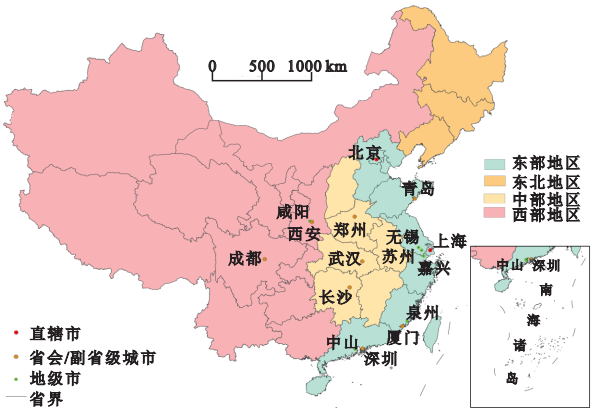

图 1 16 个地级及以上样本城市区域分布

Fig.1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16 sample cities at or above the prefectural leve

剔除部分缺失值样本后，有效个体样本为 27 030 个，其中农业户籍样本 23 433 个，占总样本量的 86.69%，非农户籍样本 3 597 个，占 13.31%。样本城市覆盖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25]，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不同的行政等级序列（表 1）。

1.2 变量

按照前文分析，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因素分为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和城市因素 3 组。个体初始因素包括：性别（男性=0，为参照组，下同）、户籍类型（农业户籍=0）、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0）、来源区域（东部地区=0）、与老家距离（跨省=0）、老家承包地面积和房屋面积等，共 7 个变量。中介因素包括：年龄、年龄的平方、外出时长、流入地时长、当地方言掌握情况（熟练掌握=0）、职业类型（雇员=0）、家庭年收入、婚姻与配偶随迁（未婚=0）、孩子与随迁（无孩子=0）、是否参加流入地的养老保险（没参加=0）、是否参加流入地社会组织（没参加=0）、是否参加老乡会（没参加=0）等，共 12 个变量。城市因素包括：流入地城市所在区域（东部地区=0）、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口中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城市人均 GDP、城市平均房租、城市平均房价等，共 6 个变量。为了操作方便，对城市人均 GDP、城市平均房租和城市平均房价取对数。城市平均房租和城市平均房价数据购自青岛禧泰房地产数据有限公司的全国房地产市场数据主中心，城市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来自 2015 年

表 1　31 个城市样本人口学特征及分布（*n*=27 030）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s of 31 cities' samples (*n*=27 030)

项目	类别	样本量/个	所占比例/%	项目	类别	样本量/个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14 396	53.26	婚姻状况	未婚	5 393	19.95
	女	12 634	46.74		已婚	21 293	78.78
年龄	20岁及以下	1 004	3.71		离异及丧偶	344	1.27
	20~25岁	3 694	13.67	来源区域	东部地区	7 859	29.08
	25~30岁	6 055	22.40		中部地区	11 504	42.56
	30~35岁	5 298	19.60		西部地区	7 151	26.46
	35~40岁	4 377	16.19		东北地区	516	1.91
	40~45岁	3 788	14.01	流入城市等级	直辖市	3 583	13.26
	45~50岁	1978	7.32		省会与副省	12 801	47.36
	50岁及以上	836	3.09		普通地级市	6 294	23.29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2 797	10.35		县级市	4 352	16.10
	初中	13 884	51.37	流入区域	东部地区	18 547	68.62
	高中	5 775	21.37		中部地区	4 551	16.84
	大专	2 375	8.79		西部地区	3 932	14.55
	本科及以上	2 199	8.14				

注：流入区域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三大区域划分[25]；来源区域都按照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划分[26]。

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城市人口规模、城市人均 GDP 数据来自《2014 年城市统计年鉴》[27]。

因变量：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流入城市（否=0，是=1）。

1.3　分析方法

本研究分析分为 2 个部分，一是分析不同群体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差异，并进行差异性检验。二是进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的因变量是二分位变量，故采用 Logit 回归模型。在自变量中城市因素 6 个变量为宏观层次变量，其他变量为个体层次的微观变量，是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故采用专门为解决此类数据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多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24,28]，允许城市之间的回归分析在截距上存在差异，从而分析城市特征变量对因变量的独立影响。研究采用 3 个多水平回归模型（模型 A、模型 B 和模型 C）分别对总样本、农业户籍样本和非农户籍样本进行回归，其中模型 A 包括户籍类型变量，模型 B 和模型 C 不包括；模型 B 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分析包括“老家承包地面积”变量，模型 A 和模型 C 不包括。相对于常规 Logit 回归的似然比检验，A 模型和 B 模型都为 0.000 0，C 模型为 0.050 0，通过检验；此外，3 个模型的随机截距标准差分别为：0.348 5，0.358 3 和 0.169 3，超过标准差（3 个模型分别为 0.049 1，0.050 3 和 0.076 5）的 2 倍以上，由此可知 3 个模型输出结果中随机截距呈现出显著的变异，适合使用多水平回归模型。

2　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与城市因素作用分析

2.1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差异比较

流动人口愿意在调查城市落户的比例是 54.56%。个体层面（表 2），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类型以及来源区域等方面都存在差异，且都通过了差异性检验，唯有性别之间不存在差异。差异最明显的是受教育程度和户籍类型。大学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比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高近 30 个百分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高 20 个百分点。年龄呈两头低中间高的态势，30~35 岁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已婚流动人口落户意愿高于未婚流动人口。从来源区域看，来自东北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最低的是来自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

城市层面（表 2），流入地城市等级越高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高，且通过差异性检验。直辖市流

表 2 流动人口在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落户意愿的差异（n=27 030）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of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t individual level and cities' level（n=27 030）

项目	类别	愿意落户比例/%	非参数检验	项目	类别	愿意落户比例/%	非参数检验
性别	男	54.33	Pr=0.4095	户籍类型	农业户口	51.85	Pr=0.0000
	女	54.83			非农户口	72.25	
年龄	20岁及以下	47.51	Pr=0.0000	婚姻状况	未婚	51.59	Pr=0.0000
	20~25岁	51.27			已婚	55.38	
	25~30岁	57.79			离异及丧偶	50.87	
	30~35岁	60.00		来源区域	东部	62.45	Pr=0.0000
	35~40岁	55.63			中部	52.28	
	40~45岁	51.37			西部	48.06	
	45~50岁	46.66			东北	75.19	
	50岁及以上	47.25		流入城市等级	直辖市	77.81	Pr=0.0000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4.94	Pr=0.0000		省会与副省	51.66	
	初中	50.73			地级市	53.07	
	高中	56.99			县级市	46.12	
	大专	63.83		流入城市所在区域	东部地区	57.96	Pr=0.0000
	大学本科及以上	74.62			中部地区	45.81	
					西部地区	48.68	

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比省会及副省城市、普通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分别高 26.15、24.74 和 31.69 个百分点。流入东部地区城市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要高于流入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中部地区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

2.2 个体初始因素的影响分析

表 3 模型 A 显示除性别影响不显著外，其他个体初始因素都是影响流动人口落户的重要因素。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教育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影响显著，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落户意愿显著提高，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初中、高中、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受教育者分别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者的 1.14 倍、1.39 倍、1.50 倍和 1.72 倍，验证了蔡禾和王进[3]提出的个体迁移动力（个体能动性）越强越有可能转移户口的判断。户籍类型的影响显著，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是农业户籍的 1.44 倍。非农户籍人口因为具有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更加丰富的城市生活经历，更熟悉城市，个人能动性更强，有更高的落户意愿。与老家的距离影响显著，与跨省流动相比，省内跨市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强，其次是市内跨县。老家住房面积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住房面积越大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低。来源地有显著影响，与来自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来自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显著降低，而来自东北地区的显著上升。

2.3 中介因素影响分析

随时间变化的中介因素影响复杂（表 3 中模型 A）。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变化，在流入地的经历越长，落户意愿越高。随着流入地时间的增加，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熟悉程度提高，构建的社会关系更广泛，有助于落户意愿的提高。年龄是正向影响，而年龄的平方呈负向影响，且都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这就表明年龄的影响呈倒“U”型走势，随着年龄的变化落户意愿先升后降，这是本研究的一个新发现。家庭随迁方面，与没有成家的相比，成家且与配偶或子女一起在流入城市生活的流动人口有更强的落户意愿。相反，已成家但是配偶或子女在老家或其他城市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弱。总体来看，与家人，尤其是配偶和子女都在一起的流动人口有最强的落户意愿。

职业和收入方面，与普通雇员相比，雇主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自营劳动者和失业者落户意愿提

表 3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 Logit 回归结果

Table 3　Logit Regression results of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影响因素	变量		模型A（*n*=27 030）	模型B（*n*=23 433）	模型C（*n*=3 597）
初始因素	户口（农业户籍）		0.4389***	—	—
	性别（男）		0.0080	0.0108	0.0204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352**	0.1324**	0.2651
		高中	0.3870***	0.3733***	0.6474**
		大专	0.5008***	0.5125***	0.6145*
		本科及以上	0.7163***	0.6687***	1.0978***
	来源区域（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0.0336	0.0046	0.2327*
		西部地区	–0.1285**	–0.1618***	0.0574
		东北地区	0.3676**	0.4928***	0.1869
	老家的距离（跨省）	省内跨市	0.2185***	0.2068***	0.3234**
		市内跨县	0.1115*	0.1299*	0.0095
	家乡住房面积/m^2		–0.0006***	–0.0003*	–0.0020***
	承包地面积/hm^2		—	−0.0294*	—
中介因素	年龄/岁	年龄	0.0439***	0.0477***	0.0087
	年龄平方		–0.0007***	–0.0008***	–0.0003
	流动时间/a	流入地时长	0.0201***	0.0185***	0.0414***
		外出以来时长	0.0034	0.0026	0.0087
	婚姻与配偶随迁（未婚）	已婚与配偶在一起	0.1771	0.1452*	0.3648**
		配偶在老家	–0.2063**	–0.2584**	–0.0313
		配偶在其他地方	–0.6679*	–0.6937	—
	孩子与随迁（无孩子）	与孩子在一起	0.0940	0.1205*	0.0005
		孩子在老家	–0.3751***	–0.3512***	–0.4740**
		孩子在其他地方	–0.2457**	–0.2189**	–0.3866
	职业类型（雇员）	雇主	0.0012	–0.0439	0.3265*
		自营劳动者	0.0793*	0.0734*	0.1339
		失业或其他	0.1877***	0.1776***	0.2446*
	家庭收入（元）		4.80E-06*	3.59E-06	1.34E-05*
	社会保障与社会组织（没参加）	参加城市养老保险	0.0792*	0.0550	0.1292
		参加当地组织	0.1307***	0.1212**	0.2225**
		参加老乡会	0.1136**	0.1368**	–0.0981
	当地方言掌握（熟练掌握）	听得懂，会讲一些	–0.0521	–0.0426	–0.1339
		听得懂但不会讲	–0.2536***	–0.2692***	–0.1249
		不懂本地话	–0.6158***	–0.6507***	–0.2539*
城市因素	流入区域（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1.2475***	–1.3594***	–0.7552**
		西部地区	–0.5454*	–0.7619*	–0.3364
	城市人均GDP对数		0.3889*	0.3876*	0.5731***
	城市平均房价对数		–0.5141	–0.6562	0.9211**
	城市平均房租对数		–0.1075	–0.1230	–1.8466***
	城市人口规模/万人		0.0006*	0.0007*	0.0004*
	城市高等教育人口比例/%		0.0302*	0.0328*	0.0423***

注: * 为*P*<0.1、** 为 *P*<0.01、*** *P*为<0.001；分类变量括号内为参照组；“—”指模型里不含这一变量或亚变量。

高，尤其是失业者落户愿望显著最高。这显示出自营劳动者在经营过程中，失业者在生活过程中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的需求更加强烈。收入的影响显著，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落户意愿随之提高。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参加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比没参加的落户意愿提高8%，参加当地社会组织以及老乡会的流动人口，其落户意愿比不参加的分别提高 13% 和 11%。掌握当地语言越熟练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高。

2.4 城市因素影响分析

由模型 A 可知(表 3)，从城市因素来看，与东部城市相比，中西部城市的吸引力较弱，尤其是中部城市最弱，中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比东部地区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低 125%，且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人均 GDP 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强。但是城市房价和房租的影响不显著。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显著，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越高。城市高等教育人口占比越高，流动人口落户意愿越高。这些都证明了城市吸引力对落户的影响。总体而言，位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人口素质越高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越大。

3 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影响机制差异

3.1 初始因素影响的户籍差异分析

通过模型 B 和模型 C 的比较可以发现影响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因素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表 3)。教育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影响要大于非农户籍。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落户意愿逐步增强，都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相比，初中不显著，高中及以上才显著。由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仅占 2.84%，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者占 33.72%，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分别是 11.5% 和 4.21%。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其落户意愿高的重要原因。

来源地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更甚。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来自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相比，来自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来自中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意愿没有显著差别，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有着最强的落户意愿。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与来自东部地区的相比，来自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都不显著，反而是来自中部地区的更愿意落户。

近距离的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远距离跨省的流动人口有更高的落户意愿，但是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而言，市内跨县与跨省相比差异不显著。总体来看，省内非流出地所在城市是最佳选择。老家住房面积的影响无论是对非农户籍还是对农业户籍人口都有负向的显著影响，且对非农户籍的影响更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此外，老家承包地对农业户籍人口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承包地面积越大，落户意愿越低。

3.2 中介因素影响的户籍差异分析

通过模型 B 和模型 C 的比较，发现流入地的时长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都有显著影响(表 3)，居留时间越长对流入地越熟悉，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年龄所显示的倒“U”型影响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显著，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不显著。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呈倒“U”型，25~40 岁的落户意愿较高，其中 30~35 岁最高(图 2)。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年龄小的时候由于城市生活经历相对较少，对流入城市熟悉程度低，对户口不敏感；随着年龄增加，对城市认识提高，对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落户意愿上升；当年龄达到一定程度、孩子成人后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尤其是子女教育需求降低，落户意愿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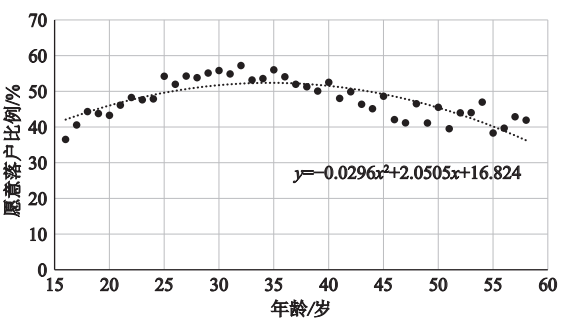

图 2 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随年龄的变化

Fig.2 The change of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age

对流入地方言的掌握程度，与熟练掌握当地方言相比，“听得懂、会讲一些”的农业户籍流动人

口落户意愿不显著，“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以及“不懂本地话”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显著下降。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而言，与熟练掌握当地方言相比，只有“不懂本地话”的有显著差异。而对当地方言熟练掌握的比例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要远远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表 4)，这也是造成落户意愿户籍差异因素之一。参加流入地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对农业户籍，还是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都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是，参加老乡会对农业户籍人口落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对非农户籍人口影响不显著，而且系数为负。这也表明了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更加依赖老乡会等非本地社会关系。

表 4　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掌握流入地方言情况比较/%

Table 4　The skill of local language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当地方言掌握情况	农业户籍	非农户籍
听得懂也会说	28.66	37.98
听得懂，也会讲一些	24.93	20.35
听得懂一些但不会讲	30.33	27.22
不懂本地话	16.08	14.46

配偶与孩子是否随迁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影响都是一致的，家庭化迁移对落户意愿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配偶随迁比例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差别不大，但是孩子随迁比例农业户籍落后 12 个百分点(表 5)，农村留守儿童比例较高是造成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低的又一重要因素。

表 5　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家庭随迁比较/%

Table 5　The ratio of family migration of non-agri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项目	家庭随迁情况	农业户籍	非农户籍
已婚流动人口	与配偶在一起	93.94	92.69
	配偶在老家	6.04	7.31
	配偶在其他地方	0.02	0
育有孩子的流动人口	与孩子一起	60.57	72.52
	孩子在老家	35.18	24.20
	孩子在其他城市	4.24	3.28

3.3　城市因素影响的户籍差异分析

通过模型 B 和模型 C 的比较发现(表 3)，在城市因素方面，无论是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还是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对东部城市的喜好程度都要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且城市规模越大落户意愿越高。城市人均 GDP 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对两个群体落户意愿都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但对非农户籍的作用更强，在 0.001 的水平上显著。城市房价和房租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影响显著，且房价是正向影响，而房租是负向影响，分别在 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显著。但是房价和房租对农业户籍影响不显著。城市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对此更敏感，影响更大。总体而言，与初始因素和中介因素不同，流入地城市因素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强。这从另一个层面说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在落户选择上更加主动，更在意落户地的品质和吸引力。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是在自身、家庭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中逐步变化和调整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个体初始因素、中介因素和城市因素 3 个方面的因素无论是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还是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都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对农业户籍和非农户籍流动人口是不同的。初始因素和中介因素对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影响更大，城市因素对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影响更明显。总体来看，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同样是流动人口，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比非农户籍流动人口面临着更多的障碍，限制因素更多且更复杂，个体初始能动性弱，需要更长时间的适应。相反，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多数从城市长大，具有适应流入地城市的优势，不仅个体能动性更强，且更加注重流入城市的品质和区位。因此，从政策和社会支持的角度看，可变的中介因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关键。

第一，个体初始因素中所体现的个人能动性不仅对落户意愿，而且对实际落户能力都具有重要影响。即使外部环境一致，面对同样的城市，个体能动性不同的流动人口对落户的认知和预期存在差异。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与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群体性差异是在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形成

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自身能力不足，对政策及外部环境把握不稳定，成为市民化的关键障碍。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提高个人能动性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已经步入工作的流动人口而言，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市民化的有力举措。

第二，大城市以及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高，非农户籍流动人口表现尤其明显。但这些城市落户门槛高，成为推进市民化的两难问题。城市规模分级是目前落户门槛设置的基础。按照常住人口规模制定的城市分级落户政策与推动落户的初衷存在诸多不匹配的地方。在外来人口比例高的城市，以常住人口作为落户标准，大多数人是无法取得当地户口的。超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应该是实际居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因此，在落户门槛设置上，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规模分级，在此基础上根据个人自愿原则稳妥落实。对于北京和上海等户口管制最严格的一线大城市，要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协同作用，通过外围城镇解决核心城市落户压力。

第三，从 3 组因素来看，与个体初始因素和城市因素相对稳定不同，中介因素随着流动过程而逐步改变，提高落户意愿中介因素是关键，尤其是家庭随迁尤为关键。在家庭分离的情况下，个人无法形成稳定的预期，更无法独立在流入地安家落户。市民化政策的完善要着力解决举家迁移面临的问题，促进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对已婚，且夫妻共同迁移家庭降低积分要求，并为他们在城市的家庭团聚和充分享有家庭生活创造条件。

最后，由于篇幅所限，没有结合文献深入探讨落户意愿与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及形成机制，期待之后的研究能更进一步。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胡陈冲, 朱宇, 林李月, 等.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一项在福建省的问卷调查[J]. 人口与发展, 2011, 17(3): 2-10. [Hu Chenchong, Zhu Yu, Lin Liyue et al. Analysis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sights from a survey in Fujian Province.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1, 17(3): 2-10.]

[2] 田明, 李辰, 赖德胜.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悖论及解释[J]. 人口与经济, 2019(6): 1-13. [Tian Ming, Li Chen, Lai Desheng.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Luohu" of rural migrants: A paradox and explanation.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9(6): 1-13.]

[3] 蔡禾, 王进. "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6): 86-113. [Cai He, Wang Jin. A Study on migrant workers ' permanent migration intentions. Sociological Study, 2007(6): 86-113.]

[4] Zhu Y.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the cities: Beyond the Hukou reform[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07, 31(1): 65-76.

[5] 林李月, 朱宇.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696-1709. [Lin Liyue, Zhu Yu. 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Evidence from the 2012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696-1709.]

[6] 欧阳慧.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实践中的落户困境与突破[J]. 经济纵横, 2020(6): 57-62. [Ouyang Hui.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settling down" in the new round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0(6): 57-62.]

[7] 梅建明, 陈汉芳. 户籍制度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9(5): 67-71. [Mei jianming, Chen Hanfang. Influ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on the urbanization of transferring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39(5): 67-71.]

[8] 都阳, 蔡昉, 屈小波, 等. 延续中国奇迹: 从户籍制度改革中收获红利[J]. 经济研究, 2014(8): 4-14. [Du Yang, Cai Fang, Qu Xiaobo et al. Sustain the China miracle: Reaping the dividends from Hukou reforms. Economic Research, 2014(8): 4-14.]

[9]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2015)[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6.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National report on new urbanization in 2015. Beijing: China Planning Press, 2016.]

[10] 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2020-02-28.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cs. Statistical communiqué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2019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2020-02-28.]

[11] 朱宇, 林李月. 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居留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文献综述及其启示[J]. 人口与经济, 2019(2): 17-27. [Zhu Yu, Lin Liyu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and its determinants: A literature review and its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 Economics, 2019(2): 17-27.]

[12] Tang S S, Hao P. Floaters, settlers, and returnees: Settlement in-

tention and Hukou conversion of China ’s rural migrants[J]. China Review, 2018, 18(1): 11-34.

[13] 张翼.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2): 14-26. [Zhang Yi. The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conversion to local urban residency and the choice of the path to urbanization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1(2): 14-26.]

[14] 朱琳, 刘彦随.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4): 461-467. [Zhu Lin, Liu Yansui. Influencing factors behind peasant’s desire for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uring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Dancheng County. 2012, 31(4): 461-467.]

[15] 邱鸿博, 赵卫华. 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农民工落户城镇意愿的分析[J]. 南方农村, 2013, 29(6): 4-9. [Qiu Hongbo, Zhao Weihua. The analysis of the willing of off-farm workers settled in c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Southern Population, 2013, 29(6): 4-9.]

[16] 秦立建, 王震. 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5): 99-106. [Qin Lijian, Wang Zhen.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 transfer to urban Hukou.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4(5): 99-106.]

[17] 章洵, 陈宁, 石人炳. 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城市落户意愿影响及其代际差异[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9(1): 61-66. [Zhang Xun, Chen Ning, Shi Renbing.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household inten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8, 19(1): 61-66.]

[18] 张鹏, 郝宇彪, 陈卫民. 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2011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评论, 2014(1): 58-68. [Zhang Peng, Hao Yubiao, Chen Weimin. Happines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igration decision. Economic Review, 2014(1): 58-68.]

[19] 王晓丽, 赵畅. 农村流动人口户籍迁入意愿研究[J]. 学术探索, 2015(6): 112-117. [Wang Xiaoli, Zhao Chang. Analysis on rural floating population’s Hukou transfer intension.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5(6): 112-117.]

[20] 廖柳文, 刘沛林. 外来务工人员进城落户意愿调查分析——以湖南省长沙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1, 31(12): 2007-2012. [Liao Liuwen, Liu Peili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settle down in the working city: The case of Changsha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31(12): 2007-2012.]

[21] 卢小君, 向军.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研究[J]. 调研世界, 2013(11): 41-46. [Lu Xiaojun, Xiang Jun. A study on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of migrant workers.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2013(11): 41-46.]

[22] Clark W A V, Davies W S. Family migration and mobility sequ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patial mo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fe course[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07, 17: 591-622.

[23] Geist C, McManus P A. Geographical Mo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8, 14(4): 283-303.

[24] 田明. 地方因素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研究[J]. 地理科学, 2017, 37(7): 997-1005. [Tian Ming. Local factors effects on the urban integration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37(7): 997-1005.]

[25] 陆大道, 杨勤业, 毛汉英, 等. 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Lu Dadao, Yang Qinye, Mao Hanying 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eijing:Science Press, 2003.]

[26] 国家统计局. 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N/OL]. 2011-6-13. 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The division method of Eastern, middl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regionhttp://www.stats.gov.cn/ztjc/zthd/sjtjr/dejtjkfr/tjkp/201106/t20110613_71947.htm.2011-6-13.]

[27] 国家统计局.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city statistics yearbook (2014).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5.]

[28] Luke A Douglas. Multilevel modeling[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2004.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ifferences and the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Urban China

Tian Ming, Liu Yueme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can be known a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s the key factor to improve the new-type urbaniza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willingness of *Hukou* transfer are very complex. However, the existing studies have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with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Besid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various influencing factors is not clear, which makes the mechanism research lack of depth, as a result, th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are limited.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through a multi-level regression logit model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initial agency, mediating factors and urban factors. I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of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and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Data comes from the Survey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s, which is conduc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in 2013 and 2014.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gradually adjus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t is found that people with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ave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their *Hukou* in the cities than people with agricult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initial factors, mediating factors and urban factors a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both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e stronger the personal agency is, the stronge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the stronger urban attraction, the stronger the willingn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transfer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mediating factors that change with time is the key to the change of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ffects are different between agricultural and non-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First of all, the initial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ct of their hometown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mediating factors, such as age and the length of going out, on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is greater than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hirdly, the non-agricultural populatio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of the city and have stronger personal agency in the choic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destinations. The 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ore sensitive to almost all kinds of factors due to less urban life experience and weak personal agency,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are more complex. The non-agricultural floating population have strong personal agency, few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and have a stronger preference for the quality and location of the city. Combined with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nd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we put forward to policy suggestion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citizeniz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intention of *Hukou* transfer; personal agenc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influence mechanism